

《蒙古源流》汉文本促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 李金花 萨仁高娃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蒙古源流》，成书于1662年，是十七世纪产生的蒙古编年史中最负盛名的一部，被誉为从古至十七世纪的蒙古族通史，与《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合称蒙古族三大史学著作。该书成书百年后（1766），深受乾隆皇帝的青睐而被进奉宫廷，遂先译成满文，由满文又译成汉文本《蒙古源流》，并被收入《四库全书》。

《清实录》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二月丙午，“谕蒙古内元清吉斯汗之裔均系博尔济吉特氏，而《元史》内称元帝为奇渥温氏。以汉字译蒙古文间有语音不合处。然亦不至如此河汉。现在校正史书，书内舛误甚多，而污蔑蒙古之语，亦不一而足。不可不为之湔雪。成袞扎布系喀尔喀旧人，或伊得自传闻。或该处旧有记载，著传谕，令其查明具奏外，并交理藩院，亦行文内扎萨克，查伊等有无传闻记载之处。令其各自声明报部，由部汇题奏闻。”^①乾隆帝对《元史》所记“奇渥温氏”提出质疑。由此，定边左副将军成袞扎布根据亲知所闻，同时查阅家藏《蒙古源流》，察明原委，解除了乾隆的疑惑。继而，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三月辛未又谕曰：“元清吉斯汗之后裔俱系博尔济吉特氏，而《元史》谓元帝为奇渥温氏，彼此不符，因令成袞扎布查奏。今据称，蒙古台吉等素称奇岳特后裔，系博尔济吉特氏，查阅清吉斯汗时纪载世系之书，亦然看来汉字书为奇渥温，尚属有因，盖伊等以汉音译蒙古字，故将奇岳特讹为奇渥温耳。著将汉字史书内奇渥温改书奇岳特，并传谕成袞扎布，该处既有清吉斯汗世系记载档案，著录一份进呈以便史书汉文。”^②因而，《蒙古源流》被进呈宫廷的同时，着手满文翻译，于乾隆四十二年由舒赫德和奎林始译汉文本，乾隆五十四年缮写完成，五十六年装函收入《四库全书》中（图1）。从此，《蒙古源流》引起世人重视，得到广泛流传，陆续出现德、日、朝鲜译注本、拉丁转写本，以及不同文种抄本、殿本的影印本和晒蓝本等。《四库全书》收《钦定蒙古源流》，对该文献的研究和流传具有承上启下意义。

^①《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七百五十四》，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二月丙午条。

^②《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七百五十六》，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三月辛未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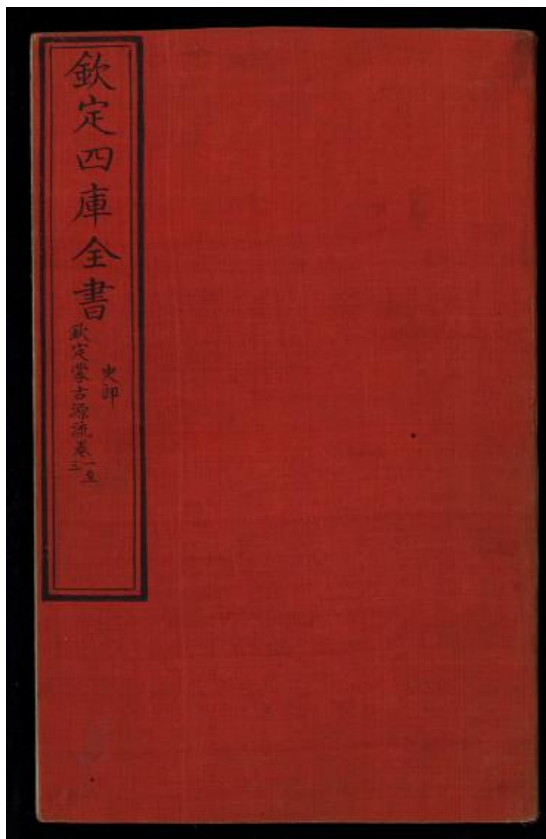


图1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收《钦定蒙古源流》封面

另一方面，《蒙古源流》汉文本的产生，对清代“厘定”部分蒙古地名、人名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典型案例为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所参考的《蒙古源流》。乾隆帝批阅《通鉴辑览》，认为：“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讹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释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尤为鄙陋可笑。盖由章句迂生，既不能深通译语，兼且逞其私智，高下其手，讹以传讹，从未有能正其失者”^①，于是“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期于折衷至是，一订旧史之蹉驳”，成就了《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其中《元史语解》部分的作法是“按：元以蒙古语为本语解内，但释解义概不复注蒙古语，其中姓氏、地名、官名、人名无解义者，俱以《蒙古源流》考今地名、《八旗姓氏通谱》、官名改字面订之”^②。我们看《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中《元史语解》，典型的一条为将一贯使用的“成吉思”三字改为“青吉斯”，且解释“卷一作‘成吉思’，今从《蒙古源流》改正太祖尊号”^③，说明《元史语解》中的“青吉斯”来自《蒙古源流》。同时“谕旨依照御制的满、蒙、汉字辞典，改译辽、金、元三史，依校正重修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改《四库全书》史部、子部、集部

^① 《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八九八，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戊寅日谕。

^② 道光四年（1824）校刊《辽金元三朝国语解·元史语解》卷一，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满文 0517，第9册，卷端题名下注。

^③ 道光四年（1824）校刊《辽金元三朝国语解·元史语解》卷一，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满文 0517，第9册第二叶。

关涉三朝史事的内容”。^①因而《四库全书》收相关蒙古史中的文字“厘定”，直接源自《蒙古源流》的汉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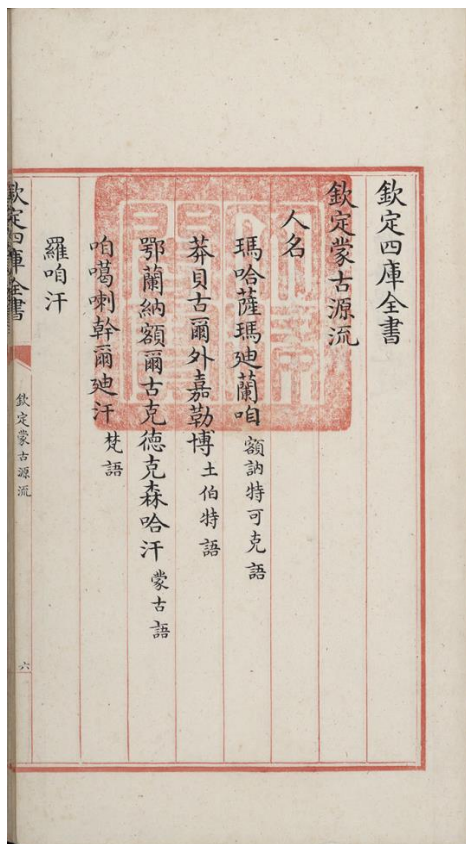


图2 《钦定蒙古源流》卷端

《四库全书》收《钦定蒙古源流》，凡3册，属“史部”杂史类第1542函，为《四库全书》中收入的唯一一部蒙古族通史，也是唯一一部汉文译民族文字的历史著作，正如其提要中所言：“首尾赅备，颇与《永乐大典》所载《元朝秘史》体例相近。前者我皇上几余览古，以元代奇渥温得姓所自，必史乘传讹。询之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因以此书进御。考证本末，始知奇渥温为‘却特’之误。数百年之承讹袭谬，得藉以釐订阐明。既已揭其旨于《御批通鉴辑览》，复以是编宣付馆臣，译以汉文，润色排比，纂成八卷。”阐述汉文《蒙古源流》的产生经过，又以“仰惟我国家万方同轨，中外向风。蒙古诸部，久为臣仆。乃得以其流传秘册，充外史之储藏。用以参考旧文，尽却耳食沿讹之陋，一统同文之盛治，洵亘古为独隆矣”。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代，蒙古文《蒙古源流》被译成满文与汉文本，遂被收入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中，使该经典的流传外延极其扩大，使其名扬五湖四海，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迎来了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盛世。

^① 姚艳芳《〈四库全书〉编纂中对民族语译音纠误探析》，《贵州文史丛刊》2021年第4期，第69页。